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乡土小说研究

张志平 著

本书研究“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对这一时段的乡土文学作全方位的扫描。作者占有资料比较丰富，几乎审视了“四十年代”所有较为重要的与乡土题材有关的小说，可以看出作者是下了大工夫的。本书从时代背景、基本模式、表现特征、人物特征等方面进行梳理与评析；此前还少见这样内容充实、论述全面的有关“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专论。

——曾修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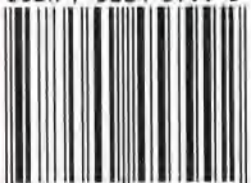
作者在大量的初始的第一手资料的梳理中，建构起自身的学术观点，论从史出。宏观的理论建构与细致的文本阅读，使本书具有很好的实证意义与理论归纳效果。本书行文流畅，没有空泛的理论说教，一切都服从于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与爬梳。但是，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之中，又足以表现出作者对作品的把握能力，尤其是对有的作品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新见。

——丁帆

本书是在乡土文学研究方面富有创见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其开拓性表现在：（1）一般乡土文学研究主要将重点放在二三十年代和新时期以及台湾的六十年代，对“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关注不够，用力不够，论述甚为粗略。本书的研究将这一薄弱环节作了很好的弥补。（2）对“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特征作了很有见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发现并表述了时代召唤与主体诉求之间的历史遇合，不仅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乡土文学的一种理论，而且为国统区—解放区乡土小说的一体化研究和整体性观照提供了理论的可能。（3）对于“革命闯将·狗腿子·阿Q一族”的乡土形象系列作了富有趣味的联系和论述。这样的文学现象反映了农村生活以及乡土小说作家主体心态的巨大变异。能有这样的发现，件之以对农民之于土地复杂感情的揭示，使得本书达到了相当的社会学、文化学深度。

——朱寿桐

ISBN 7-5004-5799-5



9 787500 457992 >

ISBN 7-5004-5799-5

定价：27.00元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乡土小说研究

张志平 著
导师 许志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研究/张志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9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799-5

I. 中… II. 张… III. 乡土文学-小说-文学研
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3916 号

责任编辑 易小放
责任校对 徐幼玲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99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通,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的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锐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目 录

楔子：不朽的故事	(1)
第一章 乡土小说：时代重压下的审美选择	(16)
一 “大时代”对作家的双重召唤	(18)
二 时代召唤和主体诉求的遇合	(36)
三 艰难的选择	(51)
四 “大时代”的歌手	(66)
第二章 “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建构	(84)
一 乡土记忆和时代生活的审美整合	(85)
二 “政治化写作”模式的建构和解构	(104)
三 民族意识的表达和自我价值的确证	(130)
第三章 清晰和混沌	
——“四十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的两脉流向 及其整合	(154)
一 文本的可理解性和叙事的清晰化	(155)
二 呈现于未成年人感知中的世界景观	(176)
三 “悲凉的乡土”上的“苦命人”	(193)
四 清晰和混沌	(208)

第四章 土地：家园或囚牢

——“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乡土意识…………… (229)

- 一 老年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血性…………… (230)
- 二 中国民众的经验主义认知范式…………… (245)
- 三 革命闯将·狗腿子·阿Q一族…………… (259)
- 四 土地：家园或囚牢…………… (274)

第五章 言语生成同民众主体性的生成和确立

——“四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深层意义空间…………… (298)

- 一 “无声的中国”里“沉默的国民”…………… (299)
- 二 民众的言语生成…………… (313)
- 三 说理大会：民众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的生产
方式…………… (328)
- 四 仰视和俯视…………… (348)

结语 艰难的旅程…………… (367)

后记…………… (370)

楔子：不朽的故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理论范式所建构的理论和逻辑框架中，“四十年代”文学特指1937年7月7日至1949年10月1日，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文学。在这一长达十二年多的漫漫历史时期内，有十一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中，作家同全国民众一道，在辗转迁徙、贫病交困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危难和精神折磨。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饮恨吞声、毁家纾难、奋起自救、浴火重生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作家用整个生命追随、推助和游弋时代潮流的时代，一个中国作家用全副心灵感受、倾听和记录时代潮音的时代。

叶紫在《〈丰收〉自序》里作过这样的表白：“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毛脚毛手。有时候，作者简直象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①后来，他沉痛地对满红说：“我现在的的生活，全然不能由我支配。我精神上的债务太重了。我亲历了不知多少斗争的场面……凡是参加这些搏斗中的人，都时刻地在向我提出无声的倾诉，‘勒逼’我为他们写下些什么，然而我这枝拙笔啊！我能为他们写下些什么呢。《丰收》算是初次的尝试，我担心辜负那班为人间的真善、光明

^① 见《丰收》，容光书局1935年版。

与正义而抗争的人所流去的血!”^① 1940年，李健吾从叶紫的小说中“看到的不仅是农人苦人，也许全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②。叶紫的创作心态和李健吾对叶紫小说的解读——即灼热的道义感、负疚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一把开启“四十年代”文学历史展开和运作态势的钥匙。^③

—

时人心目中的“四十年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1927年12月7日，鲁迅在《〈尘影〉题辞》里，仰仗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穿越时空的洞察和睿智，把当下的时代命名为“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并用其特有的晦涩、艰深的语言，阐释了“大时代”的历史特征。^④ 1937年7月7日午夜，卢沟桥的枪炮声响起后，时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鲁迅心目中的“大时代”或许并不是“四十年代”，但“大时代”已成为时人命名其所处时代的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图书和期刊总目表明，题名里有“大时代”这一关键词的图书和期刊集中问世于“四十年代”和二十世纪末期，由此不难窥见个中消息。相形之下，“大时代”这一关键词出现在“四十年代”问世的图书和期刊的题名里，更能给人一种崇高、悲壮的情感冲击力。

① 满红：《悼〈丰收〉的作者——叶紫》，载《长风》月刊第1卷第2期，1940年2月1日。

② 李健吾：《叶紫论》，载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1940年4月1—5日。

③ 叶紫的小说虽大多创作于“三十年代”，但是，他同“四十年代”作家在创作心态上具有同一性。

④ 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

“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地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①。这是政治领袖心目中的“大时代”，文艺界对“大时代”的体认、想象和建构，也几乎未能超出这个范围。茅盾指出：“这时代的特征是：曙光虽已在望，但黑暗势力尚很猖獗，人民大众已经觉醒，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但数千年的传统的负荷尚绊住他们的脚步，知识分子眼中是雪亮的，心头却有说不出的苦闷。”^②在路翎看来，“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③。1944年，陈尘在论述纪果庵的散文创作时也说，眼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矛盾的时代，旧的倒塌新的未建的时代，一个社会里存在着许多社会的时代。人类除了受战争饥馑的迫害之外，内心里是思想的冲突，苦闷和忧郁”^④。的确，“四十年代”是一个民族复兴和民众新生的伟大时代，其除旧布新的历史特征一如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叙述者所说，“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张爱玲是一位在现实生活中竭力实现世俗理想、在文学世界里最大限度表达个体化生命经验的作家，她对“大时代”的历史特征也深表认同：“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⑤

① 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

②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国际反法西斯文学的轮廓》，载《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

③ 路翎：《自白——〈财主底儿女们〉题记》，载《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15日。

④ 陈尘：《纪果庵论》，载上海《风雨谈》第14期，1944年8月9日。

⑤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

“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饱经风霜、作出巨大奉献和牺牲的伟大时代。《四世同堂》是老舍于1949年初旅美期间完稿的皇皇巨著，其中有两个极富隐喻意味的场景。一是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程长顺的太太生下一个满脸皱纹的儿子；^①二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展露之时，活泼可爱的小妮子被活活饿死。在秉持和平主义理念的日本老婆子眼里，历尽沧桑的祁老人痛不欲生地抱着刚刚死去的小妮子的景象，俨然“一个半死的老人抱着一个死去了的孩子——正好像一个半死不活的中国怀里抱着成千上万个死去了的孩子”。这是老舍基于其历史意识和生命体验，用文学的方式，对“大时代”的体认、想象和建构。因其历史意识和生命体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泛性，“一个满脸皱纹的新生儿”和“一个半死不活的中国怀里抱着成千上万个死去了的孩子”，已凝固为隐喻“四十年代”历史特征的经典意象。

二

1948年，袁可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情绪里有人的情绪与艺术情绪，在信仰里有抽象的与感觉的，在意义里有逻辑本文与诗本文，在现实有人生现实与诗现实，在生活有生活经验与诗经验，在行动有具体行动与象征行动等等分别”，英美人民派和浪漫派“对于诗的迷信”，“起于有同一称谓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实质的混淆，都远离诗作为一种文字艺术的本质，而有强烈的歪曲诗、代替诗的坏倾向”^②。在他所

^① 这一场景在老舍随后完稿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中再度出现：鼓书艺人秀莲像莲花一样纯洁芬芳、高雅脱俗，在险恶多舛的人生道路上历尽沧桑后，她生下一个五磅重、又红又皱巴、活像百岁老人的女儿。

^② 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新批评”第五章》，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11期，1948年4月。

列举的各种人们“对于诗的迷信”中，有一种值得注意，即人们把诗的“象征行动”同现实的“具体行动”混为一谈。如此一来，诗影响社会的范围从象征领域扩大到生活世界，诗影响社会的方式从诗——受众——社会简化为诗——社会。实质是，诗人为了使诗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造现实世界的应时作用，在诗和受众的关系上，用耳提面命取代潜移默化的熏陶、细雨润物般的感染。

众所周知，对文学立竿见影的现实效用的“迷信”，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最为普遍的价值诉求，“四十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赋予这种诉求以最大的历史合理性。如果把这一价值诉求称之为“行动主义”，那么“大时代”正是一个“行动”的年代。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响彻中华大地，也经久不息地回荡在每个人的心头。诚如《海上述林》的一段话所说：“歌德的‘浮士德’，是一个人的历史。他决定要冲破旧世界束缚他的罗网。而跳进生活里去，为的要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在行动之中，而不是在书本里，找寻生活的意义和幸福。”^①范泉1945年也明确提出：“文艺是民族的血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应当重视文艺，因而我们更应当重视文艺工作者的行为。”^②的确，“四十年代”作家格外看重现实的“具体行动”而非文学的“象征行动”，他们“不再静静的在明窗净几之下享受着作家的安闲的生活”，“他们应了祖国的呼唤而走出书室以外”，他们克服了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心理上的层层障碍，“在以笔、以口、以纸、以歌唱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抗战”。不少人在交织着枪声和火光的战场、在长期颠沛流离的途中倒下了，活着的人仍继续在“为

^① 转引自洪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载《群众》第9卷第23、24期，1944年12月25日。

^② 范泉：《八年来的上海文艺工作者》，载《文艺春秋从刊》之五《黎明》，1945年9月1日。

民主、自由，为和平建国而奋斗”^①。譬如，何其芳从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转变为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闻一多走出并不宁静的书斋，甘当一个奋勇搏击现实政治风浪的民主斗士。

自1942年春天后，何其芳几乎终止了诗歌创作。因为，在他看来，“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我们的民族的灾难是如此深重，她底每一个忠实的儿女都应该担负起双倍的担子。一个人不能成天只是唱歌。许多事情我都要学习做”。面对呼啸前进的“犬时代”，这位昔日的“画梦诗人”不由生出这样的慨叹：“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②到“四十年代”末，忙于做具体工作和改造自己的何其芳只写了三首诗，并且都不是抒情诗。其人生选择的结果，也许让后人深感惋惜且深感困惑，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真实无疑、正确无误的，因为，他那时正服膺于这一信念：“真正神圣庄严者并非个人的东西而是大多数被压迫与被剥削者的集体的利益，为这种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才是今天的人类的最崇高的品德。”^③

① 郑振铎：《不朽的故事——为“七·七”纪念抗战中亡故的作家们而作》，载《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

② 何其芳：《〈夜歌〉初版后记》，载《诗文学丛刊》第1辑《诗人与诗》，1945年2月。

③ 何其芳：《评〈芳草天涯〉》，载《中原、希望、文哨联刊》第1期，1946年1月。